

王銘銘

人类学家的“历史”更像是“现在中的过去”

近些年来,人类学家、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在进行人类学研究并推进其中国化的同时,也积极开展相关普及工作,尤其是有关中国东南、西南及欧洲乡村研究,引起学界关注。他同时也关注文明与广义人文的关系,撰写大量论著,最近出版了《人文生境》一书。近日,王铭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——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

A 因缘巧合走上人类学研究道路

羊城晚报:您是怎么走上人类学研究道路的?

王铭铭:我少年时并没有接触过人类学,是进了大学后才了解的,走上人类学研究的道路,是因为有大学老师的引导。

羊城晚报: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最热的时候,当时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个专业?

王铭铭:我读大学时,“下海”的确是热潮,不少中小学同学经商去了,有的成了当时说的“万元户”(有钱人)。我考上大学,选了考古专业,我的家人和乡亲并不是很理解。说实话,我选择考古,原因也不“单纯”,我只是了解到这个专业能提供一整年的田野实习条件。那时我急切地想着去老家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,而考古专业显然满足了这个要求。

我在厦门大学读本科之初,它还没有人类学系,我们系是在厦门大学三年级时才创办的。我本来蛮喜欢考古专业,甚至想致力于商周考古研究。大学三年级时,老师们(他们多数是林惠祥先生的弟子)创办了人类学系。我们整个班级被转到这个新建的系里,也就成了其第一届本科生。在考古学上也接触到人类学,通过林惠祥先生的旧著和李亦园先生等的著作,以及来华讲学的“老外”的讲座,初步对它有所了解,也产生了兴趣。

我后来去英国伦敦大学念博士,他们教的人类学是社会人类学,与社会学比较接近,没有考古这个分支领域。去英国以前,我已经接触到20世纪前期留英人类学博士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著作,深受其吸引。我是在老先生留学英伦50年后去伦敦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。人类学有某种“好古幽思”,对现代性有深刻反思,这很吸引我。这恐怕与我个人成长经历也有关系。我出生在泉州这座“遗产之城”,这座城里,即使在“文革”期间,人们的行为依然“守旧”,习俗古朴。矛盾的是,它在古代却有相当长的“海外交通史”。我觉得人类学有助于我在历史中审视,激发新思想。

羊城晚报:作为过来人,您认为兴趣、专业和职业三者如何取舍、平衡?

王铭铭:一个人的兴趣假如就是他的专业和职业,那他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了。不过我们往往不是“最幸福的人”,因而需要在三者中取舍、平衡。这从一个反面说明,唯有认识到“最幸福的人”是不需要取舍、平衡的,我们才能做好取舍、平衡,在不如意(也就是三者不能达成平衡)之时,理解处境的由来,找到适应它的办法。

本土志

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,这次阳山之贬在韩愈的学术、文化生命中的意义如何呢?



在中国古代政治上,发生过无数次贬谪,有些仅仅作为政治斗争的结局,留下的是被贬者失意、苦闷哀伤;有些则构成思想、文化的发展契机,对当地后来的思想、文化产生深远影响。唐贞元十九年(803年)韩愈的阳山之贬,无疑属于后者。

韩愈于贞元二十年(804年)二月中下旬到任阳山,贞元二十一年(805年)四五月间离开。这一年多的时间,于韩愈而言,是在沉潜之中蕴含着转机的时间;于阳山而言,则是在历史上空前的高光时刻。

正史对韩愈在阳山的记载只有短短13个字:“有爱在民,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。”作为正史韩愈传的事实基础,韩愈门人李翱、皇甫湜所作《行状》《神道碑》中的记载也差不多;但阳山县后来的史志文献对韩愈这段治理经历的叙述则是浓墨重彩、大笔渲染的。阳山县在明代以前没有专志,明永乐十五年(1417年)知县李冕始修县志,后来屡经重修,但完整保存下来的不多。《中国方志库》中收录了三种《阳山县志》:

B 摆脱西方视角还有待努力

羊城晚报:如果要向普罗大众介绍什么是人类学,您会怎样介绍?

王铭铭:我很喜欢一些科普作品,它们往往出自于大师之手,深入浅出地把一门学科的对象、目标、方法、思想脉络、现状娓娓道来。我也努力过,比如,写过《人类学是什么?》,但我的努力好像并不成功,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

现在对所谓“普罗大众”(其实他们多数是年轻的读者)有影响的,好像是别的东西了。特别是能适应年轻人口味的东西可能比较有影响,而我正在走向“老龄”。我深知在这种状况下,我们特别需要以科普作品如实介绍人类学,纠正误解,但我感到难度越来越大。

羊城晚报:人类学和人类学有何异同?

王铭铭:二者关系很密切,差异也蛮大。人类学曾经是文明史,是比历史学更宏大的历史学,后来变成以田野工作为中心的研究,出现了“反历史”潮流,但四五十年以来,历史重新成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之一,它与历史学关系重新密切起来。

羊城晚报:关于闽南的人类学研究,除了闽南是您的故乡之外,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它还有哪些吸引您的地方?

王铭铭:一百多年来,在与人类学相关的领域里,有关闽南的研究学术积累丰厚,而当下,这个区域也广受关注,有大批学者到这个区域从事研究。在我看来,闽南已构成一个“学术区”。作为一个“学术区”,它有自己的特殊问题意识。过去有不少学者在这里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史,成就很高,他们关于“小资本主义”和“乡族主义”、礼仪与风俗、家族与信仰等等的研究很有启发。

我对“民间信仰”比较关注。从学术角度来看,我觉得闽南“民间信仰”里蕴含一些有待挖掘的“智慧”,这些“智慧”触及到我称之为“人文生境”的边界,关涉到人物、神三者构成的“广义社会”,而这种“社会”,则又触及到哲学上的“内在”与“超越”的关系问题,很值得作为重点来研究和思考。

羊城晚报:闽南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?

王铭铭:我的经验研究开始于闽南(也兼及台湾的汉人乡村),接着,我有几年在华北乡村与域外徘徊,近20多年来,我则主要在西南区域从事学术活动。

羊城晚报:作为一门源自西方的学科,中国当代人类学研究“中国化”的程度如何?

王铭铭:一方面,这有待更多人关注,另一方面,讨论这种“化”的人往往只是在喊口号,其话语的内容在本质上

C 闽南已构成一个“学术区”

的起始地。这些年我得空便回到闽南去,曾出于机缘巧合带着学生在泉州安溪、鲤城、惠安做过几项研究,也组织过闽南研究读书会,情况在《茶·街·庙》这本文集里都有记载。两三年来,我回闽南的机会更多了,但我分心做了许多理论研究工作,做经验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限制,只好随缘。现在有两个新一届的博士生在闽南做研究,都在研究“民间信仰”。他们如果能做好研究,写出有气象的作品,那我会很高兴。

羊城晚报:您坚持这么多年的人类学研究动力是什么?

王铭铭:是什么动力使我坚持做人类学而没有“绝望”?恐怕是这门学问的“魅力”吧。没错,它是近代西学,但我相信它有古代的苗子,我们的古代也有它的苗子,所以,我不觉得它等同于西学,我觉得它是“我”的一部分。

羊城晚报:有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?

王铭铭:我不习惯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,而习惯于“跟着感觉走”。从某个角度看,我做的人类学也不见得符合这门学科的严格定义(往往是狭义的),我只是在借它的名义来做“学问”。

羊城晚报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并不是中国的,甚至往往是比西方更西方的东西。我觉得这很遗憾。

羊城晚报: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西方视角?

王铭铭:这有待努力。羊城晚报: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在世界人类学研究中处于什么样的水平?

王铭铭:中国的社会人类学曾出现过对世界学术有贡献的杰出学者,比如,大家比较了解的费孝通、林耀华、李安宅、翟同祖、田汝康等。现在学科整体还有差距需要缩短。

羊城晚报:还有哪些方面的差距?

王铭铭:差距有许多方面,比如:(1)我们尚未形成自己的学术,因而讨论问题、处理经验和理论,都常常流于模仿西学的表面;(2)我们的大学人类学教学系统性不足,随意性有余,培养的人只好靠他们的天分成才,偶然性极大;(3)我们的区域研究视野有待扩展,纵深有待深挖,现在我们国力强了,人到处走,表面上有了某种“世界活动”,但“身游有余,心游不足”,思想上的收效甚微。

王铭铭:您觉得这么多年的人类学研究动力是什么?

王铭铭:是什么动力使我坚持做人类学而没有“绝望”?恐怕是这门学问的“魅力”吧。没错,它是近代西学,但我相信它有古代的苗子,我们的古代也有它的苗子,所以,我不觉得它等同于西学,我觉得它是“我”的一部分。

羊城晚报:有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?

王铭铭:我不习惯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,而习惯于“跟着感觉走”。从某个角度看,我做的人类学也不见得符合这门学科的严格定义(往往是狭义的),我只是在借它的名义来做“学问”。

羊城晚报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王铭铭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王铭铭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王铭铭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

王铭铭

D 做学问习惯于“跟着感觉走”

羊城晚报:老一辈学者往往有“学术救国”的理想,您这么多年从事人类学研究,觉得人类学对您意味着什么?

王铭铭:现在的人们更爱谈的是“把自己作为方法”,这意味着要把个人当作世界的尺度。我们生活在一个“后激情年代”,适时的“生存性智慧”恐怕是拒绝所有魅惑,沉浸于自己的“肉身日常”中,那样比较舒适而安全。也许是因为我并不是在这个时代长大的人,所以我还是长期受某种东西所魅惑,而魅惑也给了我某种“激情”。这股“激情”是来自“学术救国”吗?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但我暗自觉得人类学意味着很多,对我们这个国家与文明意味着很多。若是我理解得对,那么,人类学的目标是为自己的文明跨出自己的文明、为自己的时代跨出自己的时代,“跨”既是方法,也是目标本身,但它并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,但要真的做到“跨”却不见得容易。

羊城晚报:您坚持这么多年的人类学研究动力是什么?

王铭铭:是什么动力使我坚持做人类学而没有“绝望”?恐怕是这门学问的“魅力”吧。没错,它是近代西学,但我相信它有古代的苗子,我们的古代也有它的苗子,所以,我不觉得它等同于西学,我觉得它是“我”的一部分。

羊城晚报:有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?

王铭铭:我不习惯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,而习惯于“跟着感觉走”。从某个角度看,我做的人类学也不见得符合这门学科的严格定义(往往是狭义的),我只是在借它的名义来做“学问”。

羊城晚报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王铭铭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王铭铭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王铭铭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王铭铭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王铭铭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王铭铭:您会放下它吗?“放下”这个词值得玩味,您的意思是“不再牵挂它”?如果是这样,那我必须说,我暂时还依旧“牵挂”它。未来是否会“放下”?我不知道。

深读

这是爱情的摹本,也是人性的展厅

建立在写实之上的荒诞

□谢小灵

《桃李不言》系“70后”实力派作家黄金明关于岭南叙事的小说力作,是他出版的第四部长篇小说。小说的时间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,围绕一所南方乡村初中的日常管理、少年成长及师生关系等层面展开叙述,塑造了一批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。全书共七章,成书前接受了文学期刊的检验,曾先后发表于《花城》《延河》《星火》《青春》《绿洲》《飞天》《雨花》等七家刊物。

这是一部另类而惊悚的成长小说,却建立在扎实的写实笔触之上,显得真实却又具有刀锋般的荒诞。作家沈博在黄花初中毕业20年后,故地重游,跟昔日恋人姚伯陷入了对似水年华的追忆之中,昔日的青春记忆抽丝剥茧,诸多谜团水落石出……乡村少年梦想通过读书摆脱农民命运,但在路上随时被击倒或毁掉,绝大多数在残酷的命运漩涡前仆后继,这跟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一脉相承。

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之下,学校仿佛是残酷的战场,一系列偶然或人为的事件,将他们犹如七彩丝线般编织于斑斓的人性之网。作者呈现了对“校园政治”的独特视角及洞见,对乡村少年压抑心灵的剖析尤为深刻,对20世纪80年代封闭式乡村教育进行了反思,并对其进行了反讽式叙述。

在黄花初中,无论教师还是学生,仿佛都有多重身份或多个侧面。譬如孟、谭、赵、钱、陆、刘等教师,他们是教师、诗人、艺术家、发明者,也是俗人、商人、猎艳者乃至阴谋家。他们高呼理想主义,又再三妥协。他们短兵相接,血溅五步。他们暗箭伤人,口蜜腹剑。他们是朋友,又是仇敌。他们是猎手,又是猎物。他们进退两难,不由自主。他们在灵与肉的高空上走钢丝……小说的主要人物思想复杂,内心隐秘,精神有分裂,行为多失常。每个人物都有致命的软肋,或见不得光的事。而这一切,既有美好温馨,也

有污秽凄苦,并笼罩着叙述者回忆时挥之不去的隐痛和阴影。这是爱情的摹本,也是人性的展厅,可谓一部深刻的命运寓言,更是一部残酷的成长故事。

小说的主题有存在主义文学的荒诞和悖谬,梦幻与现实的界限常相混淆,记忆与想象既是对真实感的捍卫,又是对生活的虚拟及真相的歪曲。作者对形式的迷恋,显示了一往无前的实验精神。打破常规思维及线性结构,常在不可能处展开情节。其开放性叙事神出鬼没,作者努力将每一部分都写得像开头那么精彩,力求让读者手不释卷。

小说在叙事上有创新,这是一个中国套盒式的结构,故事中套着故事,而多条线索网叠交织,多重情景相互拼嵌、重叠及映照,既互补又互否,往复回旋,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复调结构,具有多重解读及阐释的可能。人物讲述各执一词,真假难辨。在细节上,显示出饱满的写实主义风格,从整体看,又具有巴洛克风格乃至后现代主义特征。

在类型小说的外壳里寓居深刻的思考,或者灌输其先锋实验意图,这向来是小说家黄金明的拿手好戏,《桃李不言》也不例外。他在气势磅礴的叙述中,渗入骨髓的怀念,既匪夷所思,又让人震撼,充满层出不穷的悬念、天马行空的叙事和汪洋恣肆的想象力,如此交织融汇,便造就了一部震撼人心的力作。

《自我决定的孤独:难以建立亲密关系的孤独》[德]伊丽莎·冯·塔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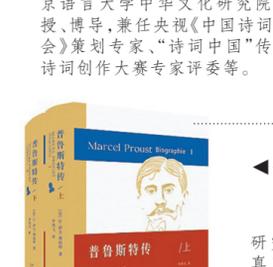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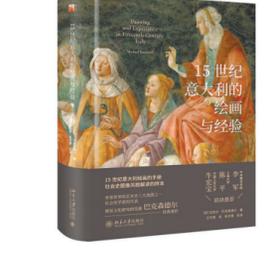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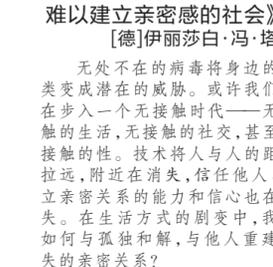
无处不在的病毒将身边的同类变成潜在的威胁。或许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无接触时代——无接触的生活,无接触的社交,甚至无接触的性。技术将人与人的距离拉远,附近在消失,信任他人、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和信心也在消失。在生活方式的剧变中,我们如何与孤独和解,与他人重建丢失的亲密关系?

《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》[英]迈克尔·巴克森德尔

书中将意大利绘画纳入15世纪意大利的经济和商业体系中,通过梳理合同、书信、账目材料,考证了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贸易,解释了当时的各种日常活动和行为习惯,例如祷告、舞蹈、测量、战争等对绘画风格的塑造。

《唐诗十讲》刘青海

该书可读性强,女性视角,文笔细腻,深入浅出。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、博导,兼任央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策划专家、“诗词中国”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专家评委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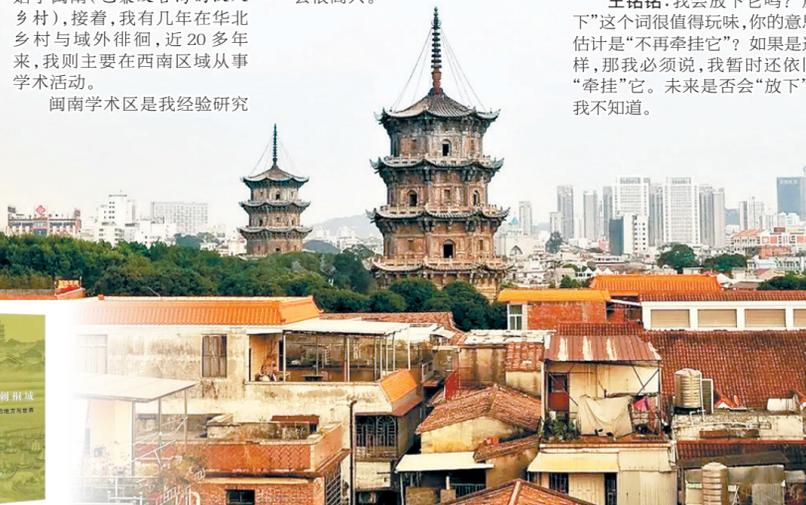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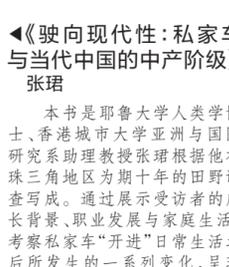


有污秽凄苦,并笼罩着叙述者回忆时挥之不去的隐痛和阴影。这是爱情的摹本,也是人性的展厅,可谓一部深刻的命运寓言,更是一部残酷的成长故事。

小说的主题有存在主义文学的荒诞和悖谬,梦幻与现实的界限常相混淆,记忆与想象既是对真实感的捍卫,又是对生活的虚拟及真相的歪曲。作者对形式的迷恋,显示了一往无前的实验精神。打破常规思维及线性结构,常在不可能处展开情节。其开放性叙事神出鬼没,作者努力将每一部分都写得像开头那么精彩,力求让读者手不释卷。

小说在叙事上有创新,这是一个中国套盒式的结构,故事中套着故事,而多条线索网叠交织,多重情景相互拼嵌、重叠及映照,既互补又互否,往复回旋,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复调结构,具有多重解读及阐释的可能。人物讲述各执一词,真假难辨。在细节上,显示出饱满的写实主义风格,从整体看,又具有巴洛克风格乃至后现代主义特征。

在类型小说的外壳里寓居深刻的思考,或者灌输其先锋实验意图,这向来是小说家黄金明的拿手好戏,《桃李不言》也不例外。他在气势磅礴的叙述中,渗入骨髓的怀念,既匪夷所思,又让人震撼,充满层出不穷的悬念、天马行空的叙事和汪洋恣肆的想象力,如此交织融汇,便造就了一部震撼人心的力作。



泉州开元寺

韩愈成就阳山的“高光”时刻

□杨国安

清顺治十五年(1658年)刻的8卷本,清乾隆十二年(1747年)刻的22卷本和民国时期铅印的18卷本。在这些史志著作中,韩愈几乎无处不在,其存在已溢出了传统的史志著作的体例之外。以现存较早的清顺治本为例,全书8卷,处处浮现着昌黎公的身影,弥漫着他的影响。山水中有他行踪,到达过的龙宫滩、同冠峡;名胜中有他栖止过的读书台、游息洞、钓鱼台;他与区册曾经留宿过的地方被命名为通儒乡;他经常盘桓、读书于其上的山被命名为贤令山。在两卷《艺文志》中,他的诗文专列为一卷,后来众多作者的诗文为一卷。

韩愈被贬阳山,与他后来被贬潮州,有相似之处,也有不同之处。相似之处在于:其一,两次都因直言事被贬,前次因论旱饥,后次因谏迎佛骨。其二,都以遭贬之身,赢得当地人民的敬爱戴和敬仰。在阳山是“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”,在潮州则是“一片江山皆姓韩”。不同之处在于:其一,贬阳山时,韩愈仅为御史;贬潮州时,韩愈

已为侍郎。其二,韩愈贬潮时的善政,驱鳄鱼,禁奴隶,兴教育,都有文献可证;而他在阳山的政治活动,文献中却只有“有爱在民”四个字。因而后人常困惑不解:“退之令阳山也,阳之人以韩字其子,其思深哉!传记退之‘有爱在民’,而莫详其所为。”(顺治本《阳山县志》卷五《人物志》附原志评论)

对于韩愈在阳山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,相关文献的直接记载确实较少。但以韩愈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,绝不至于颓废无所作为,只是文献失载罢了。但如果把视野放开,将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,那即使是仅从现存文献看,韩愈也是积极有为、成就突出的。文化力量,如风拂草,如雨润物,浸润灵魂,自然而然。

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,这次阳山之贬在韩愈的学术、文化生命中的意义如何呢?和宋代遭贬的苏东坡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超迈不同,此行在韩愈内心更多的是被贬蛮荒之地的陌生感和

屈辱感。韩、苏心境的不同,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史意义,更多的是由思想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造成的。即使如此,这样的遭际和见闻无疑也拓展了韩愈的视野,从他在这个时期和后来写的《次同冠峡》《贞女峡》《送师师》《送灵师》《答张彻》《送区弘南归》等诗作看,其所呈现出来的新奇的自然景象显然是得到了江山之助。而就其学术的发展而言,在阳山一年多的时间里,他对儒学的研究和思考也在继续深化。

在阳山县的地方文化建设中,韩愈文化无疑是最值得珍视的精神资源。阳山如今修缮了韩愈文化遗址,陆续建成了韩愈纪念馆、韩愈文化公园、韩愈纪念馆新馆等景观、仰韩文化景观,举办了一系列活动。这次出版的《韩愈与阳山》集中了阳山县韩愈研究的优势力量编写完成,全书分为韩愈传略、结缘阳山、泽被阳山、悟道阳山、韩愈阳山诗文集五个部分,较为全面地概括了韩愈与阳山的多方面内容,无疑将对阳山韩愈文化的普及和弘扬起到推动作用。

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,这次阳山之贬在韩愈的学术、文化生命中的意义如何呢?和宋代遭贬的苏东坡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超迈不同,此行在韩愈内心更多的是被贬蛮荒之地的陌生感和